



竺一可桢日记

竺可桢日记

人 1
民 9
出 3
版 6
社 1
1
9
4
2

封面设计：宁成春

竺可桢日记

第一册

(1936—1942)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517,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11001·628 定价3.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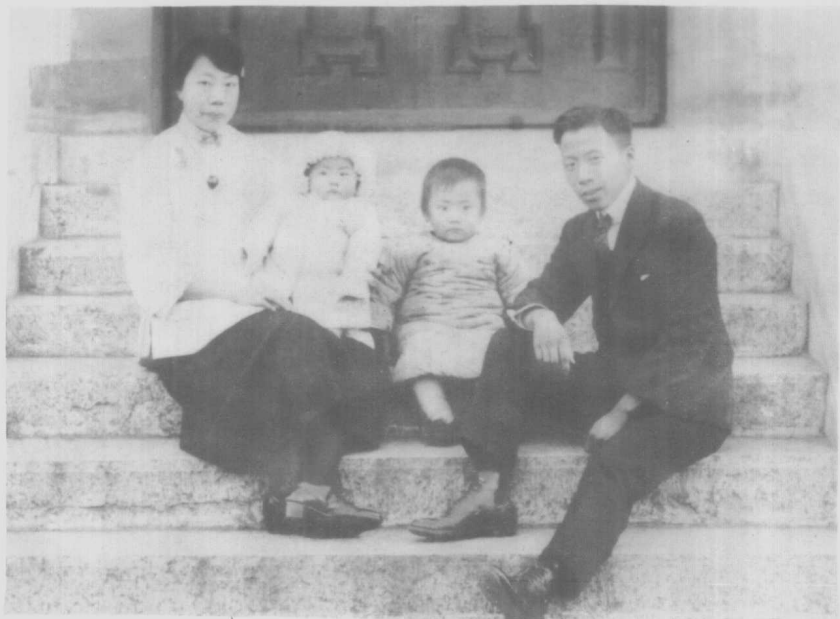


竺可桢教授

(1963年摄。时年73岁，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18年摄于美国波士顿。



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长子竺津（希文）、大女儿竺梅合影（摄于1922年）。



1936年，竺可桢、张侠魂、竺梅、次子竺衡与胡焕庸在黄山。



1938年，竺可桢（左二）与涂长望（右一）、胡焕庸（右三）、吕炯（左一）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1940年与陈汲结婚后在遵义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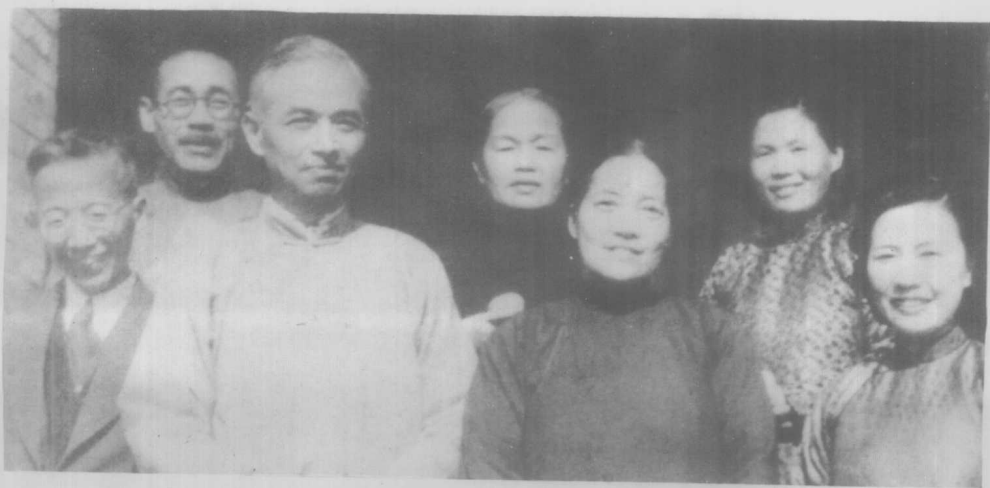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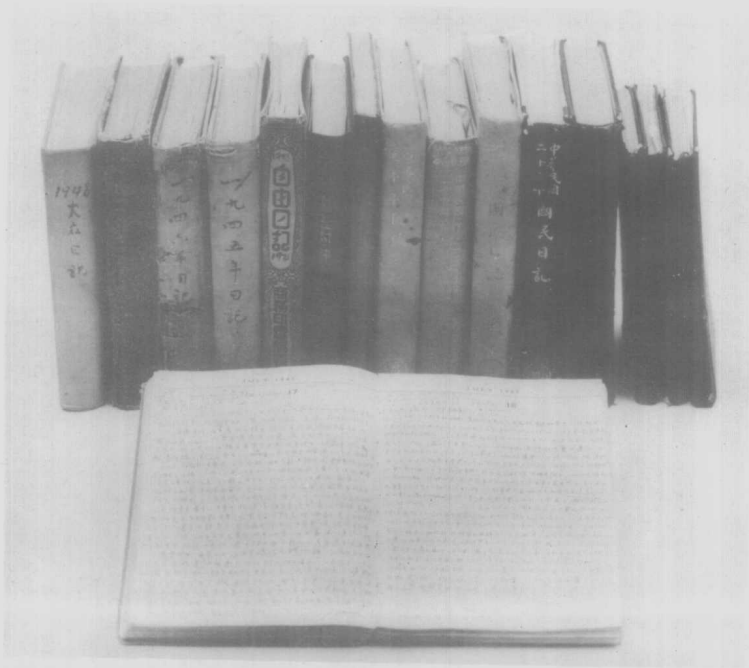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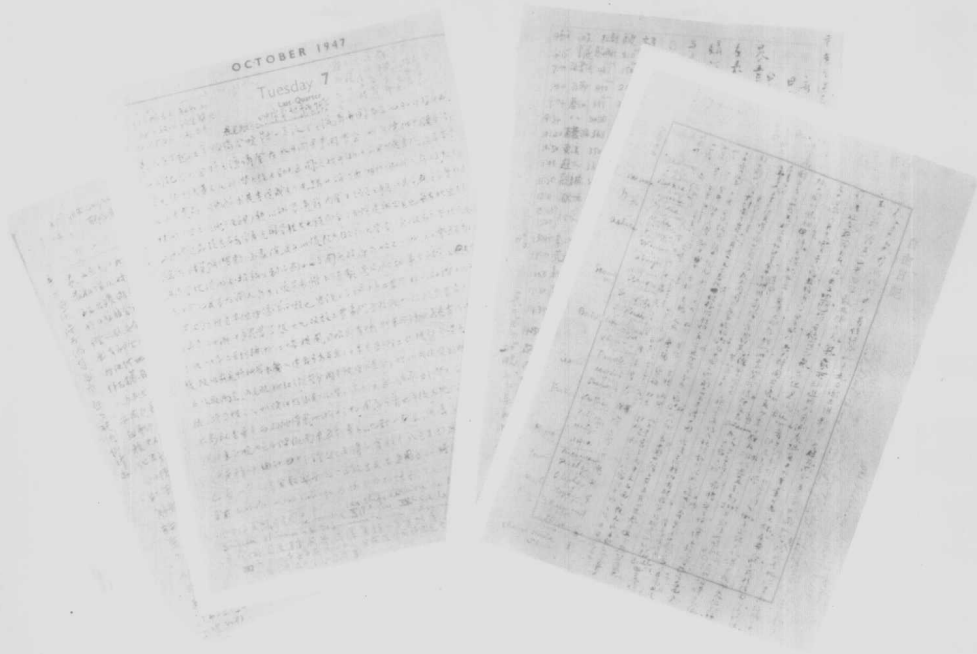
1946年5月在重庆与冯玉祥合影
(右一竺可桢，右三冯玉祥)。



1947年春与浙大校友朱祖祥、赵明强、熊全治、余文琴摄于美国密州东兰辛车站。

1947年11月在杭州与李四光等合影
(左一竺可桢,左三李四光,右三李四光夫人,右一竺可桢夫人)。





1936—1949年竺可桢日记原本及手迹。

作者简介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年青时曾在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和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读书。1910年公费留美；先就读于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读气象学，1918年得博士学位回国。在此期间，参加留美学生组织的、我国最早的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成为该社骨干成员之一。回国后，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地理学和气象学，两年后转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任地学系主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课。1925年曾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次年转至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27年中央研究院筹备时，应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筹建气象研究所，旋任所长。1936年4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仍兼气象所所长。1944年辞却气象所所长职，浙大校长职则任至1949年4月底。此外，解放前作者还兼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及地理学会理事、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社理事，并曾一度担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主任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先后被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等。1974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竺可桢早年从事气象学研究，其中对台风的研究等颇受国际

学术界重视。以后主要研究气候学，成为杰出的气候学家。他开创我国区域气候研究，重视农业气候问题，而在历史气候变迁上致力尤多，前后研究达五十年之久。1972年他发表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赞扬。例如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在评论这篇论文时指出：“在气候学的研究中，竺可桢起着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世界）学术界的前面”。他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终生不间断地从事物候的观测记录，所撰《物候学》* 一书，达到很高的水平。他在古天文学史的研究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所写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1927）及《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1944）二文，迄今仍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经典著作。此外，他一贯热心于科普工作，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竺可桢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的组织推动者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在他筹建气象研究所之前，我国只在沿海地区有少数测候台站，还多归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在他筹建气象所之后，由他亲自培训人员、购置仪器、制订规章，宣传、鼓励各地设立气象台站和编印气象书刊等，才逐渐建立起我国的气象事业，逐渐收回我国气象事业的自主权，从而为解放后气象事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基础。他是我国高等学校首先开设近代地理学课程的两个教授之一，并在东南大学首先创办地学系。我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工作者中的许多人是他当年的学生，之后也一直受到他的关心和鼓励。解放后他又亲自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推动建立了若干区域性和专业性地理研究机构，规划地理研究工作，并多次亲自参加地理考察。此外，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在综合考察、自然区划、沙漠、冰川、海洋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方面也做了不少组织推动工作，并在制定科技

* 与宛敏渭合著。

政策、培养人材等方面尽心尽知地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深受尊敬的科学界领导人。

竺可桢又是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不但使浙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大学，而且由于他坚持民主学风，十分爱护学生，对使浙大成为解放前学生运动中少数“民主堡垒”之一大有帮助，因此受到师生的由衷爱戴和社会上的重视，以至有些人认为他是我国蔡元培先生以后有数的大教育家之一。应该指出，他长浙大的十三年，除头一年局势还比较地平稳外，余十二年都在战乱动荡和艰难困苦之中，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浙大却在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是极其难得的。这虽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作为校长，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

竺可桢一生讲究求是精神（即追求真理、忠于真理的精神），凡事注重事实，不附和，不盲从，亦不专横武断；临事只问是非，不顾个人利害；办事认真负责、公平合理；勤奋好学，至老不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人朴实无华，对人诚恳、谦虚，在同事、学生中极得人心，久而弥深。

竺可桢在解放前是位爱国的、民主的学者。建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战士，并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高龄，以最大的热忱和责任心对待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竺可桢自我努力的结果。竺可桢不愧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位楷模。

茅以升序

竺可桢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不仅是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地学方面多门学科和科学史等研究事业的倡导者，并且是我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从二十世纪初，他就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矢志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披荆斩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五十余年间，他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并在教育事业、地理和气象等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第一次见到竺可桢同志是在1916年。那时，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听说有个华人办的宣传科学的组织“中国科学社”，就去申请参加。由于作为社员要经常为社刊写一些文章，而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又是竺可桢，所以，我便与他有了些接触，但那只是一般的联系而已。直到1920年回国后，我和竺可桢同在东南大学任教，我们才有了进一步的交往，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思想和经历。

我与他交往更多的还是在1936年，我在杭州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时候。那年，他也正好到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校长。时值浙大缺少任课的教授，故此他邀我去为他们做不定期的讲演，他闲暇时也曾到我的住处来互叙友情或共进晚餐。有一次，他竟还兴致勃勃地同我一起到工地上去看造桥，并在那儿呆了一上午。回来后，又特意写了篇日记来描述那天他所看到的情景（我在1981年才见到这篇日记并编入了我的《钱塘江建桥回忆》集）。他虽然不是搞土

木的，可对建桥之事却知道的很多，毋需指点，便能把施工的情况及过程写得一清二楚，连一些内行的人看起来都觉得语意贴切，条理分明，大有精通之势，可见他学识渊博及涉猎范围之广泛。

1937年以后，由于先后同是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的关系，一起开会较多，我又与竺可桢有过一段频繁的接触。其中也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他的一些朴实的工作作风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38年浙大被迫迁校时，他的那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即使妻、儿有病，他都为迁校繁忙，只顾奔波在湘桂路上。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二十多年，竺老更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扑在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上。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每天有大量的日常工作和社会工作要做，尽管如此，他还要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和自然资源的考察。记得他在71岁那年，还坚持参加了南水北调的考察队，并亲自登上了海拔4000米的阿坝高原。这是他一贯的品德，不畏长途跋涉，不畏道路艰险，只要工作需要，就一定要干！也正是因为这种坚韧不拔、勇于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味，使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感到了很大的压抑。

我最后一次见到竺老，是在1972年的秋天。碰巧，竺老的老朋友邹树文从南京来北京，听说竺老身体欠安，就约我一起去竺老家看他。故友重逢，大家自然是分外高兴，可竺老却一句不提自己的病情，也不许我们说一个字。他只是义愤填膺地对我们讲述那些年轻视和诋毁科学技术的怪现象，斥责那种把建国十七年来的一切成就都抹杀掉的谬论，并深刻地指出，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和光明。看着他的那颗耿耿赤诚的爱国之心，那种虽在病中却仍忧虑着祖国前途及科学事业繁荣的情怀，我俩都大为感动，劝他不要过于性急，科学兴国的方针终有一天会被人们视之为真理。听我们此说，竺老自然双手赞成，只是担心自己的病体等不

到这一天。事实也是，从我们那次谈话以后，不过一年多功夫，竺老就逝世了。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竺老没能看到他所希冀和盼望的事情得到实现和满足；而那次见面，竟也成了他与我们的永诀！

竺老就是这样默默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逝世对我国的科学事业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但他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竺老确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一生忠贞于祖国的科学事业，艰苦奋斗，坚持真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科学遗产，其中包括他写了几十年的一部日记。他是值得赞颂的，特别是在今天，在祖国科学事业日益繁荣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就更应该学习他那种立志于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贡献力量。《竺可桢日记》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和学习竺老的精神品德，了解他如何走过了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出版界做了一件好事。

竺老的精神永存！

1983. 3. 19

黄秉维序

《竺可桢日记》(1936—1949年)即将出版,编者要我写一序言。竺先生一生可为我们矜式的言行,他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中的建树,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贡献,浩浩如海洋。我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鳞一爪。他的著作,我还有许多没有读过;他的日记,我也仅看了很小一部分。虽然与故旧晤谈,常怀述竺先生往事,实则所涉及的亦只太仓一粟。自惭所知有限,所以踌躇不敢着墨。然而前此已有诺言,不应轻易失信,乃不揣浅薄,写成此文,略述在我心目铭刻最深的印象。

竺先生的亮节高风,也许可以用“正道直行,竭忠尽知”两句话来概括。他热爱祖国,殷切地希望民富国强。他身体力行,始终贯穿着这一坚定不移的志向。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他以极大的毅力,建立、推动和从事科学研究,置身于教育事业。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而到了关键时刻却不屈不挠,挺身而出,凌霜厉雪,义正词严。他表里如一,公而忘私。他在旧社会中出污泥而不染,在解放以后,认识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不随风摇摆,敢于坚持真理,不顾利害毁誉,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虚怀若谷,写文章先请好些人提意见,然后修改补充。讨论问题,也从善如流,不固执己见。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气象和地理,对其他科学同样抱着很大的兴趣和热忱。他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所有这些,我曾在《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内的一篇短文中谈过。现在我深切地体会到,所有这些,是一位无限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平凡而伟大的科学家的正道直行。他的伟大常常与